

# 政治伊斯兰视角下美国—伊朗关系的解读\*

常平, 王泰

(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美国—伊朗关系是当前世界最复杂的国际双边关系之一。无论从国际政治还是伊朗国内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分析, 霍梅尼主义天然地包含着强烈的反美主义倾向。同时, 在美国看来, 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导致西方社会的普遍“恐惧”, 从而将伊斯兰视为“威胁”则使“文明的冲突”成为一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 又强化了美伊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作为一种理性、倡导公正与和平的宗教, 伊斯兰教绝不是导致美伊冲突的主导因素, 更不会构成所谓“文明的冲突”。作为当前国际冲突的热点和难题, 美国—伊朗关系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显示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美国; 伊朗; 伊斯兰因素;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8)05-0025-05

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关系发展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宗教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宗教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是由宗教的属性和作用决定的。对于那些有神论者占据多数和主导地位的国家而言,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 必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sup>〔1〕</sup>从历史的经验和政治的现实来讲, 宗教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试图以美国伊朗的双边关系为个案透视伊斯兰因素在美伊关系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所谓伊斯兰因素, 就是指伊斯兰教在社会不同领域的延伸并得到相对独立发展的社会现象, 只要是在伊斯兰社会中体现伊斯兰的宗教精神的任何一种社会现象, 都可以冠之以“伊斯兰”的名目, 构成伊斯兰的因素。体现并强调伊斯兰教的教义、教法、强调认主独一, 信仰《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其他教义是伊斯兰因素的本质特点。伊斯兰因素这一重大宗教现象对于美国对伊朗的关系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察, 其一, 伊朗如何看美国: 霍梅尼主义

所包含的反美主义倾向; 其二, 美国如何看伊朗: 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看伊朗如何被美国“妖魔化”; 其三, 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层面对伊朗的认知和判断; 最后, 美国反恐战争层面的美伊关系。

## 一、霍梅尼主义的“美国含义”: 反美主义

在整个巴列维国王统治直至革命爆发前夕, 美国伊朗关系的发展并没有被打上浓厚的伊斯兰色彩。但是从间接的角度来看, 伊斯兰因素已经开始发酵或者正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未来革命发展的基础, 进而破坏了美伊关系。这集中表现在巴列维国王极具世俗化意识的“白色革命”对伊朗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的挑战以及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斯兰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及其思想的传播。

“白色革命”旨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世俗化的政策却遭到了当时伊朗宗教界的反对。1963年, 霍梅尼开始严厉抨击国王刚刚开始发动的“白色革命”, 6月霍梅尼被捕引发德黑兰的街头骚乱。此后他流亡土耳其、伊拉克、法国, 以各种方式广泛宣传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主张, 逐渐建构起一整套被称

\*〔收稿日期〕2008-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中东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04CSS004);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研究”(G13)

〔作者简介〕常平(1957-), 男, 内蒙古通辽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 王泰(1972-), 男, 内蒙古商都县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与当代中东问题。

为“霍梅尼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sup>[2]</sup>霍梅尼主义的主题就是恢复穆斯林社会“法基赫(伊斯兰教法学家——引者注)的监护”。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前穆斯林的社会和教育导致人们对法基赫的监护心存疑虑,而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由于伊斯兰的敌人——犹太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伊斯兰的诋毁造成的。他极力为伊斯兰正名,为沙里亚正名,在强调毛拉宣传伊斯兰、介入政治和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责任的同时,就必然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将外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强加给伊斯兰社会所造成的弊端和恶果。为此,霍梅尼曾经多次严厉抨击巴列维国王的对美政策。

霍梅尼猛烈抨击了巴列维国王的以色列政策,他认为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前哨基地:“帝国主义的罪恶影响在伊朗特别明显。以色列,这一普遍公认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人,在卑鄙的伊朗政府的援助下,多年来一直与穆斯林民族处于战争状态,它已渗透到国家的所有经济、军事和政治事务中;可以说,伊朗已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推而广之,也是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sup>[3]</sup>由此可见,霍梅尼主义带有强烈的“第三世界主义”的倾向,他把伊朗的许多问题归咎于“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主张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走第三世界道路,维护伊朗的独立和主权这样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被赋予了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倡导的伊斯兰政府、伊斯兰经济、伊斯兰社会和文化的内涵之中。作为在野人士,霍梅尼的反美意识打上了伊斯兰印章,同时他的伊斯兰主张的实现也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前提,这就为以后他所领导的革命政权的对美行动作了最好的注解。

1979年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就伊朗的未来发表了著名的“既不是西方体制的,也不是民主体制的,而应单纯是伊斯兰体制的”政治声明。伊朗开始全面实现伊斯兰化。“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可以说是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句革命口号和宣传口号,也是被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奉为主旨的指导思想,它不仅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高度概括,而且为其后一些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指明了要求和方向。然而,表面上这一战斗口号反对的是非伊斯兰的东方(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它赞成、拥戴、需要的只是伊斯兰,事实上,它反对的远比字面上所说的内容要多,而其侧重点则是西方,甚至是被它称之为大撒旦的美国。<sup>[4]</sup>从霍梅尼现代政治伊斯兰思想的主旨出

发,要回归伊斯兰,那么反对主张无神论和公有制的东方是自然而然的。问题在于霍梅尼既然“承认私有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其存在的适度的体系”,<sup>[4]</sup>却为什么又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走向完全的对立呢?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政治变动的角度来看,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无疑是一种到处树敌、甚至两个拳头打人的一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苏联于1979年12月27日入侵并占领阿富汗,致使伊朗苏联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霍梅尼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声明:“苏联出兵阿富汗就是针对伊朗人民的敌对行动”,<sup>[5]</sup>公开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要求苏联立即撤出阿富汗。霍梅尼从苏联入侵阿富汗认识到:“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但是,随即爆发的两伊关系危机和两伊战争给了伊朗调整两个拳头打人的政策的机会,使伊朗有可能把重点放在反西方上,此其一;其二,两伊战争的态势表明,美国选择的是在背后偏向甚至默默地支持伊拉克同时遏制伊朗的政策,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伊朗反对美国也是顺理成章的。

以上只是揭示了国际政治视角下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从伊朗国内角度来看,伊朗把美国视为大撒旦,“是有它的革命逻辑的”。<sup>[4]</sup>首先,伊斯兰革命本身需要它彻底清除同美国的政治联系、彻底清理被视为暴君的、独裁者的巴列维国王在伊朗的残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且用新的来代替是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的基本经验,伊朗也不例外。其次,令霍梅尼火上浇油的是,巴列维国王在革命胜利的前夕出逃的首选国家就是美国,并且最终又由于疾病而得到了美国的收容,这就激怒了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者。再次,在回归伊斯兰、反对东西方的生活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习俗风尚的过程中,伊朗显然更多地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影响,而不得不进行严格整饬。最后,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逻辑是在反对君主制方面,旁及到了海湾地区的君主国,而这些国家都与美国关系密切,甚至得到美国的支持,这也把美国伊朗推向对抗的边缘。

## 二、“文明冲突论”与伊朗的政治伊斯兰

毫无疑问,伊朗的神权体制不仅与西方的民主体制格格不入,即使与中东地区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也有很大区别。既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那么伊朗在革命背景下走上全面伊斯兰的历史道路,完全是伊朗人民对自己“国家特征与

形象的自我设定”和自主选择,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却认为伊朗伊斯兰神权体制的建立是对民主和自由世界(制度)的严重挑衅。伊朗是从制度上成为被建构的某种“冷战意识形态的敌人”。另外随着伊斯兰法的实施,鞭挞、剁手、用小石头将人砸死等伊斯兰传统刑法被恢复,多妻制重新合法化,都成为伊朗被美国和西方诟病其侵犯人权的把柄。美国官员和国会还经常批评伊朗对巴布教徒和犹太社团的态度。2002年7月,布什就曾明确指出,伊朗政府压制了伊朗人民“要求自由和人权的呼声”。

更为重要的是,伊斯兰革命不仅框定了伊朗国家内政的伊斯兰化,而且随后伊朗外交的伊斯兰化掀起了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扩散,从而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高度警惕。到了后冷战时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将之概括为“文明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很形象地体现了伊朗输出革命给西方和世界所带来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在伊朗统治集团看来,西方,尤其是被称为“大撒旦”的美国,是伊斯兰民族的压迫者和敌人。霍梅尼强调伊斯兰世界的一体性,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宣称“将向世界各地输出我们的革命”,为此,伊朗政府成立全球革命俱乐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1978年“人质事件”究其本质就是后冷战时代“文明冲突”的一场提前预演。正如霍梅尼曾经明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sup>[6]</sup>

正是在伊朗政局变动的影响下,在敏感多事的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幅员广阔的穆斯林世界,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带有群众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一时间,“伊斯兰威胁”从神话变为现实。西方部分舆论认为,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以及伊朗革命后采取的种种反西方的政策,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全面对抗的一个信号。

特别是当这种对抗被普及性地感染到美国和西方的舆论和大众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1993年美国一份随意抽样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最危险时,美国民众回答位于第一位的就是伊朗。在1994年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回答“不是”的仅占28%。<sup>[7]</sup>“文明冲突论”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矛盾和疏漏,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意识形态因

素,正如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专家所承认的那样,由于“9·11事件”,它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2005年8月,刚刚上任的伊朗新总统内贾德发表了被称为“几十年来最雄心勃勃的政府使命声明”,声称伊朗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在什叶派隐遁的伊玛目——马赫迪的领导下的全世界政府,而美国则在“垂死挣扎”。<sup>[8]</sup>显然,该讲话进一步把美伊矛盾推向“文明冲突”的边缘。

### 三、美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对伊朗的定位和认知

从1979年之后就恶化了的美伊关系,到克林顿总统时期又达到了新低。克林顿从其任期一开始,其官员就表达了对伊朗的深深的厌恶之情,将之列为了“国际罪犯”、“恐怖分子”、“无赖国家”。美国官员毫不掩饰他们试图通过隔绝和限制的措施压迫伊朗改变其威胁行为。<sup>[9]</sup>2001年,小布什刚刚继任美国总统后就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国家,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伊朗核问题日益凸现并迅速升级。2006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报告中,美国罗列了一大串伊朗的罪状,认为“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威胁以色列,阻碍中东和平,扰乱伊拉克的民主以及禁止它的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并首次将伊朗视作美国最大的挑战。<sup>[10]</sup>美国对伊朗的重新定位,预示着美伊关系进入更加紧张的状态。但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美国针对伊朗的战略考量更多是在地缘政治、石油经济乃至人权价值观和反恐战略的角度做出,而不是单纯从伊斯兰的角度来判断。

在一般意义上,美国和伊朗的危机被认为代表了两种不同政治和管理体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在深层意义上,对伊朗的妖魔化反映了美国政府一些强硬派官员的看法以及他们害怕这样一个神职政权正在利用并滥用伊斯兰教攻讦美国的重大利益及其盟国。这样看来,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反对世俗化的西方及其中东地区的代理人。

美方认为,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通过这把强有力的伊斯兰之剑争夺地区秩序的合法性。伊斯兰教为伊朗的领袖地位提供了可以改变的流通资本并支持其地区野心。这种领袖地位就如在世界外部是通过伊斯兰弥赛亚的多棱镜来透视和观察的。对于美国的政策精英们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于伊斯兰复兴的整体印象。

美国的官员们也力图在他们所不赞同的伊朗政府和伊斯兰之间寻找某种区别。1993年4月,国务

院负责反恐军火合作的官员劳伦斯·庞珀表示美国关心的是伊朗的行为而不是伊朗政治体制。同样,白宫关于中东问题的高级专家马丁·伊耐克 1993 年 5 月在一次阐述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持久限制”的政策时提到,美国反对的并不是伊朗的伊斯兰政府而是其行为中的一些方面。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伊斯兰仍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显著的因素,因为伊朗领袖总是用伊斯兰的方式发布声明、确定政策。一些美国官员提醒政府要认识到伊朗对伊斯兰教的利用和滥用是一颗掩盖其成为波斯湾“传统霸主”的烟雾弹。一个美国官员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意识到了伊朗革命中伊斯兰的一面,以及美国的政策制订怎样考虑这一因素。”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形容美国在对伊朗制定政策方面是含糊不清的,应该采用民族国家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宗教的概念。因此,他们倾向于把伊斯兰教定义为民族国家的概念范畴,就像他们曾经确定共产主义就是苏联一样。克林顿政府对于伊斯兰主义者立场中关于伊朗因素的重要性就在于政治伊斯兰已经成为伊朗的同义语。<sup>[11]</sup>

同样,伊朗专家理查德·科特曼认为正是通过伊朗,每个人才理解了伊斯兰政治的军事化意味着什么。前中情局官员古拉汉姆·福勒对此表示赞同并且认为有很多的因素卷入了美国的对伊政策,而不局限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湾地区的一个主导力量。对美国而言,伊朗问题的核心在于德黑兰最为深刻地对完全作为文化的资源——即伊斯兰的动员,汇集成为反抗邪恶的美国人的力量并且唤醒更多第三世界的受难者反抗西方。福勒认为,伊朗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挑战连同其他威胁是全球性质的,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对地区霸权的追求,特别是波斯湾的石油生产方面等于美国的战略目的相冲突。<sup>[11]</sup>

然而,美国对伊朗威胁的判断,并没有考虑到伊斯兰革命在国内外实行的效果。<sup>[11]</sup>正如美国一位伊朗分析家认为,“革命”远非可被模仿的模式,“只是一个既不能鼓动也不能激励支持着的空壳罢了”。伊朗已经不再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一种文化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两伊战争期间没能够煽动那些伊拉克的什叶派教徒发动起义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宣传在黎巴嫩的什叶派的确有一些市场。但是,真主党的崛起是由于黎巴嫩什叶派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被边缘化造成的,而与伊朗的社

会动员没有关系。出于对霍梅尼那种强劲的布道宣传可能会破坏海湾那些保守的、亲西方国家的稳定的恐惧事实被证明有些夸大其辞。伊朗并不能够将它那种革命伊斯兰的意识形态转化成为任何具有政治影响的骚乱。1994 年和 1995 年发生在巴林的起义也不例外。正如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私下里也承认,“巴林起义的根本原因还是基本上归结于当地内部。”同样,出现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政治腐败——正如美国官员承认的——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考虑到这些国家恶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态,不管有没有伊朗的煽动,伊斯兰主义的出现都是受欢迎的。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苏丹。苏丹人对获取伊朗的石油、金钱以及为发展嗷嗷待哺的经济提供后勤资源更感兴趣,而不是进口什么意识形态的教条。

#### 四、反恐战争背景下的美伊关系前景

到底是意识形态因素还是安全因素影响了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制订,这样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困难在于如何测定它们对于美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所占的相对分量。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会间接地影响到美国官员对伊朗政权的看法,而现实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则会直接改变政策。文化和宗教的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强化了美国官员对伊朗威胁的担忧。包括认定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破坏阿以和平进程,以及破坏海湾石油产出国稳定,再加上伊朗试图寻求核武器的计划等等。

仅以所谓的支持国际恐怖主义为例来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伊朗“继续在国内窝藏恐怖分子并支持国外的恐怖活动。”<sup>[10]</sup>早在 1983 年 10 月美国在黎巴嫩的海军兵营被炸后,伊朗就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名单”。据 2003 年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伊朗在 2002 年仍然是支持恐怖主义最积极的国家,伊朗被列为七个“赞助、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之首。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曾说:“毫无疑问,基地组织已经进入伊朗,并且找到了庇护所。”布什也在 2004 年 7 月公开指责伊朗政府为基地组织领导人提供庇护和财政支持,并表示要对伊朗是否参与“9·11 事件”进行调查。<sup>[12]</sup>

如今“9·11 事件”已经过去六个年头。美国在中东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尚未稳定的情形下,又把矛头对准了伊朗。人们对布什当年顺嘴说出的“新十字军东征”还记忆犹新的时候,2006 年 8 月 31 日,布什在美国

第 88 届退伍军人大会上正式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明美国的这场战争是“一场 21 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恐怖主义的非理性、攻击平民、制造恐怖气氛等特征使它具有与历史上德、日法西斯主义一些颇为相似的面貌。但把伊斯兰同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似乎还是第一次。必须承认,政治伊斯兰的强化是近三十年来中东意识形态的主流趋势之一,但无论如何,它不是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教与世界其他宗教一样,也主张建立一个和平与公正的世界,并且对于任何出于政治目的而对平民发动的袭击表示强烈的谴责。客观上讲,中东穆斯林在心理上是仇视西方的,但这主要源自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政策。但这并不能说明绝大多数穆斯林就是赞同恐怖主义的。事实上,在伊斯兰传统的法理中,将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抵抗手段是受到鄙视的。

从美伊关系的角度而言,如前所述,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内政的伊斯兰化(伊斯兰神权体制的建立)——是美伊在制度方面的根本性差别因素;另一方面,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新兴起,导致西方社会的普遍“恐惧”,从而将伊斯兰视为“威胁”则使“文明的冲突”成为一个正在“自我实现的预言”,又强化了美伊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但毫无疑问,把美伊关系归结到伊斯兰因素只是一种线性思维或者过于简单的看法。就围绕核问题而言,从美国对伊朗战略的终极目标(即推翻伊朗现政权)和伊朗的回应(走向核计划的不可逆

转)来分析,美国伊朗的关系,这个已经持续近 30 年的国际政治难题,远远不是终结而是正在展开,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显示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博弈双方还有太多的变数有待人们去观察和求解。

#### 〔参考文献〕

- 〔1〕梁丽萍. 宗教因素与国际政治〔J〕. 国际问题研究, 2003, (5).
- 〔2〕王彤.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45-253.
- 〔3〕〔美〕J·L·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41.
- 〔4〕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 2001. 464. 469. 473.
- 〔5〕刘竟, 张士智, 朱莉. 苏联中东关系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62.
- 〔6〕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Islam and Revolution〔M〕. Berkeley CA: Mizan Press, 1981. 305.
- 〔7〕〔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238.
- 〔8〕〔伊朗〕阿米尔·塔赫里. 伊朗: 文明的冲突〔N〕. (美国) 新闻周刊, 2005-09-05.
- 〔9〕Elaine Sciolino. Christopher Signals a Thought U. S. Line Toward New〔N〕. York Times, 1993-03-31.
- 〔10〕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 March 2006. 20.
- 〔11〕Fawaza A. Gerges 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 Clash of Culture or Clash of Interes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3-134. 118.
- 〔12〕安维华. 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的走向〔J〕. 亚非纵横, 2005, (2).

##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slamism

CHANG Ping, WANG Tai

(College of Politics & Law an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s so complicated and important that it has been the one grand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ter politics in Iran, the US and Iran had been thought a main enemy each other. Islam as a religion that advocates just and peace, it is not the leading factor which caus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and not bring about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slam; Geopolitics;

〔责任编辑 葛 鑫〕